



西方幸福经济学理论研究

□ Xifang Xingfu Jingjixue Lilun Yanjiu □

肖仲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幸福经济学理论研究

□ Xifang Xingfu Jingjixue Lilun Yanjiu □

肖仲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幸福经济学理论研究 / 肖仲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04 - 8667 - 1

I. ①西… II. ①肖… III. ①经济学 - 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374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幸福和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基于对人性的不同认识，人类思想史上对幸福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理性主义幸福观、感性主义幸福观和德性幸福观。经济学产生于道德情感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之下，自诞生之始就肩负了追求个人以及社会最大化幸福的使命。趋乐避苦的自然天性一直是自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不言自明的前提，快乐主义的功利原则和追求幸福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幸福原则一直是经济学的哲学前提和伦理基础。

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以及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的市场机制实现富国裕民的经济学思想，在经过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改造之后，经由边际学派和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化武装和数理化革命，最终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理性经济人在追逐个人私利最大化的理性指引下，参与市场，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可以自动地实现资源配置和分配的效率最大化，以帕累托最优的方式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

自经济学遭遇了“幸福悖论”的尴尬之后，人们开始质疑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效用理论和市场理论的正确性。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和期望理论，李普西和兰卡斯特提出的次优理论，阿罗提出的不可能定理，卡尼曼的心理偏差分析、非理性决策和预期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提出的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市场，实

验经济学对满意化而非最大化的验证，所有这一切都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也证明，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是自私利己与无私利他相结合的双重人性的统一体。人本主义层次需求理论也向我们揭示了幸福的真谛：幸福是一定人生阶段内，基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直到自我实现需要的整体满足水平，既有物质满足的内涵，又有精神满足的内涵，既有自然天性满足的内涵，也有社会性和关系性满足的内涵。

影响幸福的因素涵盖了物质、精神、社会性和关系性的全部内涵，包括性别、年龄、健康、民族、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社会制度、宗教、自由与选择权和参与权、期望和目标、社会比较等多个方面。心理学研究认为，这些幸福变量是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明示偏好，而非传统经济学认为的显示性偏好。因此，幸福可以通过幸福指数体系来测量和计算，这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效用不能计算的局限。

心理学、脑科学及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对“幸福悖论”的解答以及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直接导致了幸福经济学的产生。

幸福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应该是人类追求幸福的行为与稀缺资源的关系。基于人类的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人们在现实的市场活动中既秉持幸福最大化的理想原则，也坚持满意化的实践原则，这共同构成了幸福经济学的体验功利主义思想。人本主义幸福观和体验功利主义思想共同构成了幸福经济学的价值观。幸福经济学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本主义发展观，这是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序

《西方幸福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书，是我的博士研究生肖仲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一部系统研究当代西方幸福经济学理论的学术专著，也是我近几年来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在“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方向上已完成的系列成果之一。

西方幸福理论，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已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早期的哲学、伦理学幸福理论，二是两百多年来的经济学幸福理论，三是心理学幸福理论，四是现代生物学包括生理神经学和遗传学的幸福理论。尽管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在围绕如何实现人类幸福最大化展开研究，一部经济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部幸福思想史，但自“边际革命”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走上“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的效用最大化”的发展轨道，已经偏离了对人类幸福如何实现等伦理问题的强烈关注。“边际革命”的三个代表人物之一，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在1883年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专门论述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同的抽象演绎方法。他特别强调，在经济学研究中，“不管是对于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还是对于经验的一实在的取向而言，谈论任何伦理的取向都是不理智的”。而“有人之所以形成这种想法，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够认识到有关国民经济的理论与实用科学的性质和特有的课题”。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通过‘伦理取向的’研究使得那些不被人尊重的研究对象显得崇高一些。仿佛一门科学的价

值取决于其对象，……而不是取决于其研究结果的重要性、深刻性和原始性！”因此，“希望在我们的学科中采取某种伦理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源于古典时代的哲学的残余，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中世纪禁欲主义哲学的残余。然而，它至多也不过是对科学性不足的一种拙劣的补充”。^①自他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就带有浓厚的“去伦理化”特征。由此决定，幸福问题也淡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这种把幸福问题排斥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的倾向很快又得到了福利经济学的纠正。

1920年，庇古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福利经济学由此诞生。庇古认为，凡是能给人们带来满足的一切东西都叫“福利”。福利分为一般福利（满足人的一般欲望、情感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和经济福利（满足人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物质需求），从有效计量的角度出发，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福利”，也就是可以用货币直接或间接加以衡量的那部分福利，排除了对一般福利（满足人的一般欲望、情感等精神方面的需求）的研究。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但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并非是同一种学说。他在《福利经济学》一开篇就指出，“经济福利不能作为总福利的晴雨表或指数”。经济福利“不能告诉我们，在引入经济原因以后，总福利与以前有何不同；但它会告诉我们，如果那一原因未被引入，总福利会与以前有什么不同；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才是我们所要探求的信息”。^②严格地说，即便是总福利也未必能作为人类幸福的指数或晴雨表。因此，既然经济福利连总福利的指数都不能担当，它当然更不能作为人类社会的幸

① [奥地利] 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32页。

② [英] 庇古：《福利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18页。

福指数或幸福的晴雨表了。

最早、最直接提出人的幸福指数概念的是我们近邻的一个只有 63 万人的小国：不丹。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不丹前国王旺楚克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以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旺楚克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不丹从 80 年代末开始推行“全民幸福计划”。30 年来，不丹的确取得了令人惊羨的结果。从 1984 年到 1998 年，“贫穷”不丹的国民预期寿命提高了 19 岁。2008 年，旺楚克国王又主动还权于民，将国体由君主制改为君主立宪制。2009 年 7 月，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发布了最新一期“快乐星球指数”，在对 143 个国家和地区居民的“预期寿命”、“生活满意度”和“环保水平”进行测评后，不丹在 2009 年的“快乐星球指数”排行榜上位列第 17，尽管此时不丹人均 GDP 在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仅排在第 120 位。不丹国土面积的 74% 被森林所覆盖，其中有 26% 的地区被划定为保护地。1999 年，不丹政府宣布不丹为无塑料国家；2004 年，不丹又制定法律全面禁止烟草的销售，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烟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不丹在 2005 年被联合国表彰为“地球卫士”。

小国不丹在追求和践行国民幸福上的“另类”成功，逐步引起西方各界的高度重视，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也在西方经济学中升温。1974 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教授在对发达国家人口与经济的研究中发现，体现为收入增加的财富积累并不必然导致快乐的增长；尽管在收入增加至某一门槛水平以前，比如后来被广泛认可的年收入 8000 美元，收入增加与快乐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但是在跨过这一门槛之后，收入对快乐增长的影响将变得微乎其微。伊斯特林的研究发现，主观因素似乎也对快乐感受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

人们的欲望和生活成本也有可能提高。当后者提高的速度超过前者时，人们就会产生不满足感，快乐感受自然也会因此降低。伊斯特林的发现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快乐并不全靠财富，其增长水平自然也无法体现在 GDP 指标中。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化身为 GDP 膨胀的经济增长，有时甚至会给快乐感受造成损伤，比如工业发展导致环境污染，比如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再比如高负荷的工作导致健康水平下降……所有受损的东西尽管会对 GDP 有所贡献，但最终受损的却是人们的幸福和快乐。在此之后，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到 80 年代中期，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幸福感作为社会心理体系的一个部分，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从这些国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和监测结果看，虽然至今尚没有一套通用的幸福指数可以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各个民族，但公认的幸福指数高的国家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社会发展秩序井然、生态环境好、国民受教育程度较高、贫富悬殊较小、社会竞争压力较小。由此也可见，西方幸福经济学既属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又属于哲学伦理

学、心理学、遗传学和行为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

刚刚过去的 2009 年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在这 60 年中，前 30 年和后 30 年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尽管现在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最幸福，但五六十年代我国人民普遍过着“丰衣三尺布，足食二两油”的贫困生活，很多人被打成“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不少人。在历史事实面前上述观点显然有些苍白无力。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 1776 年在《国富论》中就认为：“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①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其中特别是在实施“大跃进”之后，人民群众并非处在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幸福状态，只是生活境遇艰难的呆滞的静止状态，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处于悲惨的退步状态。这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中国社会从 1958 年到 1978 年 20 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和提高。”^②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社会不论是经济福利、总的福利，还是国民的幸福感、幸福水平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应当是举世公认的。

2010 年 2 月 6 日，“汉语盘点”活动揭晓仪式在商务印书馆礼堂举行。以“汉语盘点”的活动形式来为过去的一年作总结，是资深汉语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联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新浪网推出的一项品牌活动。其目的在于扩大汉语影响、推进汉语传播、彰显汉语魅力，让人们在关心世界和中国的同时，

①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74—7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7 页。

体会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汉语盘点”活动至今连续成功举办四届。此届“汉语盘点”，于2010年1月4日正式启动，历时1个月。经由网民推荐、专家评审、网络票选等阶段，共收到推荐字词1519余条，其中国内字942个，国内词359个，国际字84个，国际词129个，并最终评选出描述2009年中国和世界的一个字、一个词。而描述2009年中国的一个字竟是“被”字。2009年，中国走入“被”时代。有人发现“被富裕”，也有人惊奇“被中奖”，有人不爽“被代表”，有人反感“被就业”……“被什么”成了一种万能句式。这其中，也包括网民讥讽各级政府公布的不合理“幸福指标”的“被幸福”。“被幸福”的流行不仅反映了人民的自我意识在觉醒，那些不能真正增进人民幸福的决策和措施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否定；而且反映了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的物质财富增加，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更加自觉和强烈。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这是因为）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①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处于某种程度的静止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出现了倒退）完全不同，我们现在的社会肯定是“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社会各阶级理应处于“快乐旺盛的状态”，但“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还没有感到“最幸福、最安乐”。这其中的原因，要么是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大师的幸福理论有问题，要么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如何保障大多数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还远远不能保证让社会上的各个阶级都处于“快乐旺盛的状态”。而不论何种原因，深入系统地研究当代西

^①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4—75页。

方幸福经济学理论，吸纳和接受其中科学合理的成分，批判和抛弃其错误偏颇之处，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真正实现科学发展，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的。

正因如此，当两年以前肖仲华同志与我商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积极支持他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研究。通过他的勤奋努力，终于完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应该说，目前国内对西方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还是非常欠缺的，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不完整的。因此，肖仲华同志这部著作所作的完整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而这正是该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之所在。当然，该著对幸福西方经济学的探讨和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有些问题尚需要进一步思考、完善和深化。相信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一定能将这部著作的不完善之处加以不断修正和弥补。

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新年讲话特别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当前我国社会老百姓的幸福需求十分强烈，各级政府又都把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作为首要任务的背景下，肖仲华同志的著作出版，无疑也适应了我国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

行文至此，农历己丑年除夕辞旧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庚寅年的钟声正在敲响。此时此景，正像北宋诗人王安石所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但愿此书的问世，能为中国人深刻理解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应该如何努力才能创造幸福生活等问题打开一扇新的门窗。

乔洪武

农历2009年除夕夜

前 言

经济学尽管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了追求人类幸福的当然使命，但是 200 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历史证明，经济学一直沿着“快乐和幸福效用化—效用化幸福物质化—物质化幸福理性化和数理化”的道路研究幸福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幸福悖论”告诉人们，物质化的效用与人类幸福水平并不存在正向比例关系，这使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陷入了尴尬境地。

社会学、心理学、生物遗传学以及经济学各分支学科都开始了幸福理论的研究，出现了幸福理论的研究热潮。面对这种幸福研究热潮，经济学似乎显得很力不从心。在幸福问题上取得了较大成就的经济学家们并未将自己的研究纳入经济学的轨道，而是试图开创一种幸福学的新领域，这使经济学面临远离幸福成为研究财富问题的专门科学的危险之中。

今天，对幸福的关注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广泛关注，放弃单纯的经济增长，追求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幸福成为经济学不可回避的必然论题。这迫使我们产生让经济学重新举起幸福大旗的冲动。因此，梳理经济学自诞生以来的幸福理论，建立经济学幸福理论的系统架构，就成了本书的出发点和目的。

为此，本书将从回顾人类幸福思想史开始，归纳、总结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生物脑科学及经济学分支学科对幸福问题的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的成果，在反思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基本命题和基本理论基础，尝试构建幸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体系。

为此，本书将首先考察心理学、遗传学和脑科学等多学科关于人性和幸福问题的交叉研究，并尝试基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定义双重人性，基于人本主义定义幸福概念，基于体验效用概念、功利主义最大化原则和行为经济学满意化原则定位幸福经济学的体验功利主义思想基础，力图为幸福经济学梳理出一套科学的基本假设，奠定一个系统且坚实的立论基础。同时，在反思传统经济学幸福理论，整合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幸福理论的基础之上，讨论不完全信息和不完美市场的真实市场环境，讨论最大化理想原则与满意化实践原则相结合的体验功利主义原则，讨论以幸福为目标的生产和消费理论，讨论人本主义的幸福价值观和发展观，并最终为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幸福国策”提供启示与借鉴。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幸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14)
第一节 什么是幸福	(14)
第二节 经济学理解的幸福	(40)
第三节 幸福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55)
第二章 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70)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70)
第二节 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76)
第三节 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84)
第三章 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中的幸福理论	(94)
第一节 行为经济学的体验功利主义幸福理论	(94)
第二节 实验经济学：体验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验证	(105)
第三节 其他分支学科中的幸福理论	(109)
第四章 幸福经济学基本假设	(117)
第一节 自然人与幸福	(117)
第二节 有限理性	(131)
第三节 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138)

第四节	满意化和最大化	(145)
第五章	幸福指数和幸福感的测量	(149)
第一节	幸福指数	(149)
第二节	幸福感的测量与核算	(160)
第六章	幸福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和供求理论	(168)
第一节	生命成本论和广义消费函数	(168)
第二节	消费与生产：基于需求层次论的供求关系	(176)
第七章	幸福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	(181)
第一节	幸福经济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181)
第二节	幸福经济学的人本发展观	(186)
第八章	总体评价与启示和借鉴	(196)
第一节	以幸福的立场看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后果	(196)
第二节	从幸福的视角看新经济的贡献	(202)
第三节	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基本的“幸福国策”	(205)
第四节	从幸福的视角看当前经济政策	(214)
结语		(219)
参考文献		(224)

导 论

一、为什么要研究幸福经济学

幸福和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都在永不停歇地研究幸福的奥秘，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或解决人类的幸福问题。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是经济学矢志不渝的梦想，同时也是历来的经济学家们前赴后继、争相高举的经济学大旗。然而，当人们发现那些生活富足甚至奢华的西方人事实上并不比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更幸福时，备感惊愕的经济学界不得不开始反思一直信奉的传统经济学理论。

亚当·斯密理解的既有“同情心”又有“利己心”的“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满足其追逐私利的“温和欲望”来实现其幸福，并通过“利己而利他”来实现富国裕民的思想，与被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归结为幸福原则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幸福”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一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快乐主义幸福思想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遗产的重心，成为两百多年来大多数社会进步的推动力。^① 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赋予“经济人”以“理性”之后，这种幸福思想的

^① [英] 理查德·莱亚德著：《不幸福的经济学》，陈佳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7页。